

# 杭州飛來峰元至元二十九年 造像題記疏證\*

許正弘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 摘要

杭州飛來峰元代石刻造像題記，今存廿餘條，都是研究當時開龕造像歷史的寶貴材料，其中兩條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題記更是藉以探討元代宗教與政治的重要線索。本文取為討論依據，先釋錄記文，說明其史料價值和可能疑義，進而聚焦於造像功德主與功德回向對象兩個問題，試圖抉隱發微，追索「文字背後的歷史真相」。藉由疏理和檢討前人考證成果，應能肯定兩條題記所見的兩位楊姓功德主，就是楊璉真伽及其子楊暗普。考定的結果，這兩條題記可說是楊氏父子歷官的獨家記載，有助於重新思考他們的政治地位，以及行宣政院設立初期的定位。而楊氏父子造像活動顯然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功德回向對象的行款和序列經過精心安排——在當朝皇帝之後，選列已故皇太子真金遺孀闊闊真及其二子。經過疏證，不僅可將題記視為真金元妃闊闊真生子問題的佐證，也對其中闕載世祖南必皇后之名有所解釋。

---

\* 收稿日期：2016.07.27，通過審查日期：2016.09.19。

本文是筆者有關元代后妃與政治的博士學位論文，在清理后妃子嗣問題時，另行獨立成篇之成果。文稿初成，惠承業師洪金富教授指正與推薦，又蒙兩位審查人提供改進建議，減少錯誤，謹此特致謝忱。

**關鍵詞：**楊璉真伽、楊暗普、闊闊真、南必、行宣政院

## 【目次】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一、前言</li><li>二、造像題記及其功德主</li><li>三、功德回向對象及其寓意<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一）真金元妃闊闊真生子問題的佐證</li><li>（二）世祖南必皇后闕載原因及其意義</li></ul></li><li>四、結論</li></ul> |
|-------------------------------------------------------------------------------------------------------------------------------------------------------------------------------------------------------|

## 一、前言

杭州的經濟與文化，從唐代以降就日益繁榮，成為南宋首都（臨安）之後更臻巔峰。唐宋時期，特別是在南宋一代，留下極其豐富的歷史文獻，引起後世學者的關注，研究成果相對豐碩。<sup>1</sup> 入元以後的杭州，繁華依舊，在來華旅行家筆下甚至仍是「世上所有最大和最高貴的城市，並且是最好的通商地」。<sup>2</sup> 不同於前朝的是，元代杭州眾多的寓居或過訪者之中，有著不少蒙古和西北各族（色目）人氏，<sup>3</sup> 從而留下諸多文化交流的記載及遺跡，尤其引人注目。杭州飛來峰的元代石刻造像就是顯著例證之一。

杭州飛來峰造像的歷史已逾千載，其中有紀年足稽的題記——從五代到明朝，長達五個世紀。這些造像及其題記，無疑都是珍貴的文物與文獻，1982 年就已名列中國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符其實也。它們可以證補習見史料之不足，發揮圖象和金石證史的功能，吸引當今學者的關注，相關論著迭見，斐然可觀。其中，有元一代在此留下六十八座龕窟，有著百餘尊造像，造像題材與佛龕形制不同以往，兼容藏傳佛教（藏式，或謂梵式）與若干漢傳佛教風格，無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獨特的文化多樣性」，<sup>4</sup> 甚至被形容是「中國龕窟造像史上最後的光亮」。<sup>5</sup>

---

<sup>1</sup> 杭州市社會科學院於 2005 年 6 月特別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而該中心自 2008 年以來主編出版《南宋史研究叢書》已達五十餘種，「南宋與杭州」作為叢書主題之一，亦有十一種之譜。研究之方興未艾，可見一斑。

<sup>2</sup> 〔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濟譯，《鄂多立克東游錄》，頁 75。

<sup>3</sup> 杭州當時的蒙古、色目人數之多，已是江南諸城之最。（見陳得芝，〈從「銷金鍋兒」到民族熔爐——元代杭州與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變〉，頁 21-22）

<sup>4</sup> 賴天兵，〈杭州飛來峰元代石刻造像藝術〉，頁 96-107。

<sup>5</sup> 這是中國美術學院朱晨博士學位論文的主標題，而其副標題為「杭州飛來峰元代造像研究」。

飛來峰元代造像的宗教意涵，尤其是關於藏式造像方面，學界已有不少專門研究，毋庸贅述。<sup>6</sup> 2012 年，南京大學楊曉春教授根據現存廿餘條元代飛來峰造像題記，撰文討論造像的開鑿過程、開鑿者和風格等問題，多有闡發，值得重視。<sup>7</sup> 事實上，這些元代造像題記，特別是其中兩條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題記，不僅有如楊氏所謂「是研究造像開鑿歷史的珍貴史料」，更是藉以探討元代宗教與政治的重要線索，仍有再作深入研析的餘地。職是之故，本文擬以至元二十九年的兩條題記為主要材料，先釋錄記文，說明其史料價值和可能疑義，補充並檢討學界對造像功德主的考證成果，進而就造像功德回向對象及其可能具有的意義略作疏證。

## 二、造像題記及其功德主

飛來峰元代造像題記，歷經明清以至現代金石書籍及研究者著錄，記文存錄情況尚稱完整。其中，楊曉春根據相關著錄、拓片或照片，重新輯整目前可見諸題記 21 條（造像題記 17 條，重裝造像題記 4 條）為一表，釋錄文字力求精確，足以依憑。<sup>8</sup> 本文希望提請注意的是至元二十九年的兩條題記，亦即楊文表列序 12 與 13 二條。為便討論計，茲予改制並參照《飛來峰造像》釋文及拓影，<sup>9</sup> 引錄有如下表：

---

<sup>6</sup> 杭州飛來峰造像的研究，概見高致宇、蘇金成，〈杭州飛來峰佛教造像的研究現狀分析〉，頁 50-52。此外，可以近年出版的兩部專著——謝繼勝等《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研究》與賴天兵《漢藏瑰寶——杭州飛來峰造像研究》作為代表。

<sup>7</sup> 楊曉春，〈杭州飛來峰元代佛教造像的開鑿過程、開鑿者與造像風格問題——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頁 428-444。以下引用該文，為免煩冗，逕取副題，略作〈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另請注意的是，下文提及古今學者，無論前輩師長，一準臨文不諱例，直書姓名，敬稱與職銜從略。

<sup>8</sup> 楊曉春，〈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表 1：飛來峰元代佛教造像題記匯錄」。（頁 430-434）

<sup>9</sup> 高念華主編，《飛來峰造像》，頁 124-125、140。

| 序 | 位置      | 造像題材<br>(風格)                   | 題記<br>高×廣 | 題記釋文(前加阿拉伯數字表示行號)                                                                                                                                                                                    |
|---|---------|--------------------------------|-----------|------------------------------------------------------------------------------------------------------------------------------------------------------------------------------------------------------|
| 一 | 第98龕左側  | 西方三聖<br>(漢式)                   | 57×53     | 1 大元國功德主，宣授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永<br>2 福大師楊，謹發誠心，捐捨淨財，命工鑄造<br>3 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聖像三尊。<br>4 端為祝延<br>5 皇帝聖壽萬安，闔闔真妃壽齡綿遠，<br>6 甘木羅太子、帖木兒太子壽筭千秋，<br>7 文武百官常居祿位。祈保自身世壽延長，福<br>8 基永固，子孫昌盛，如意吉祥者。<br>9 至元壬辰二十九年七月仲秋吉日建。 |
| 二 | 第99龕正下方 | 無量壽佛、<br>文殊菩薩、<br>救度佛母<br>(藏式) | 60×140    | 1 大元國功德主，資政大夫、<br>2 行宣政院使楊，謹發<br>3 誠心，捐捨淨財，命工鑄造<br>4 無□壽佛、文殊菩薩、<br>5 救度佛母聖像三尊。祝延<br>6 聖壽萬安，闔闔真妃壽齡綿遠，<br>7 甘木羅太子、帖木兒太子<br>8 壽筭千秋。祈保自身<br>9 世壽延長，福基永固，子孫<br>10 昌盛，如意吉祥者。<br>11 至元壬辰二十九年七月仲秋吉日建。        |

這兩條題記同時而又比鄰鑄造，現存於飛來峰西麓呼猿洞。兩相對讀記文，行數及字數即便有別，<sup>10</sup> 卻不難發現體式、內容與時間的類同。首先說明它們在飛來峰造像題記中具有的特殊意義。元代飛來峰的造像活

<sup>10</sup> 賴天兵比較兩個造像龕窟的規模，指出：第99號龕較98號龕為大，適與各自功德主官階高下相符，亦即官階高者所開龕較大。（見賴天兵，〈元代的釋教都總統所與楊總統〉，頁421）

動，據現有紀年題記可知：發端於至元十九年，結束於至元二十九年，為期大約十年。其中，至元二十六至二十九年間的造像活動較為集中，又以至元二十九年最是興盛。<sup>11</sup> 在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與七月的短短兩個月裡，先後開鑿了四龕造像，七月更是佔了三龕。這裡引錄討論的兩條題記所屬龕窟，都是採用一佛二菩薩的習見三尊龕像，不同於其他同年開造的個別菩薩或天王的單尊龕像，顯得更為隆重和正式。至於祈願回向的對象尤具深意，請詳下文。

其次解釋這兩條題記一個用詞的疑義。兩條記文之末俱署「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仲秋吉日」，仲秋一般係指八月，容易令人起疑。事實不然。這裡所謂的「七月仲秋」，雖鮮見於其他文獻，但考量到該年置閏六月，稱七月為仲秋，恐非失誤而有其故。第二條題記的功德主，另曾以相同題銜，命工鑄造多聞天王像一尊（第 75 龕），題記末署時間亦同，仍是「七月仲秋」，可說是又一例證。<sup>12</sup> 這個特殊的用詞，益證兩條題記記述的準確而足以信據。

再次討論兩條題記所謂「功德主」的問題。這兩位功德主，一是「宣授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永福大師」，一是「資政大夫、行宣政院使」，皆為江南佛教事務的主導人物，地位非比尋常。可惜他們都只識其姓，不誌其名，時人想必瞭然於心，今人卻易一無所知，有俟於上下求索以確定其人。重新審視學界對於兩位楊姓功德主的考證成果，仍有再作補充和檢討的餘地，具論如下。

第一條題記的功德主即楊璉真伽，幾可說是學界共識，較無疑問。在此有必要稍加介述楊璉真伽其人。<sup>13</sup> 楊璉真伽，河西唐兀（Tangut）人，亦即前代西夏的党項族。楊姓是唐兀習見姓氏，其名璉真伽則取自藏

---

<sup>11</sup> 楊曉春，〈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頁 435。

<sup>12</sup> 記文詳見楊曉春，〈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頁 433。

<sup>13</sup> 關於楊璉真伽生平，陳高華先後撰有二文，題為〈略論楊璉真伽和楊暗普父子〉與〈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伽〉，考論最是精詳。另可參見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頁 478-483。陳氏二文成文較早，卻已能注意杭州元代造像的材料，惜未及據以深入討論。

文 Rin-chen rgya，意為寶印。<sup>14</sup> 楊氏生卒年、出身與早年經歷已難確考，只知他於至元十四年二月受任江南總攝，從此長年主管江南佛教事務，直到至元二十八年世祖權臣桑哥（Sengge, ?-1291）倒臺，他被視為黨與遭到清算而罷職。楊璉真伽主管江南佛教事務期間，大力推行藏傳佛教，修寺、建塔、刻經、造像，甚至發掘南宋皇室攢宮而用藏傳佛法以為厭鎮。他於至元二十五年開始在飛來峰造像，短短四、五年間，至少主持開鑿三個龕窟，促使當地造像活動達至鼎盛。<sup>15</sup> 楊璉真伽受到世祖重用而得以長久在任的原因，除了他與桑哥保持密切關係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他能在江南忠實執行世祖宗教政策的原則而有實績，亦即：將藏傳佛教置於諸教諸派之上，在佛教與道教之中崇佛抑道，在佛教教派之中重教輕禪。楊氏免官之後，幾乎消失於史冊，有學者推測他可能不久即已亡故，甚至斷言他死於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以前。<sup>16</sup> 2004 年，賴天兵發表〈楊璉真伽與元代飛來峰造像相關問題的探討〉，較早考定這條題記功德主為楊璉真伽，並據以修正前人成說，約有兩點貢獻：楊璉真伽在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尚在人世，可能仍在杭州，其卒當更在此後。此其一。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是，楊璉真伽曾經一度官復原職。<sup>17</sup>

第二條題記的功德主，僅知姓楊，或謂楊謹，或謂楊璉真伽，前揭賴天兵文已辨其誤，但仍無法確考其人，只知可能是蒙古或色目人氏。<sup>18</sup> 關於這位楊姓行宣政院使的考訂，有兩篇文章值得提請注意。一是林梅村所撰〈故國不堪回首〉，收入 2013 年出版的個人論文集《大朝春秋——

<sup>14</sup> 陳得芝，〈從「銷金鍋兒」到民族熔爐——元代杭州與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變〉，頁 29 注 3。

<sup>15</sup> 楊曉春，〈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頁 431-433。據該文表載，以楊璉真伽為造像者，計有序 5、7、12-14，共五處。其中，序 13 與 14 的功德主為楊姓行宣政院使，應非楊璉真伽，說詳下文。

<sup>16</sup> 陳高華，〈略論楊璉真伽和楊暗普父子〉，頁 394；野上俊靜，〈桑哥と楊璉真伽——元代宗教史の一面——〉，頁 257-258。

<sup>17</sup> 賴天兵，〈楊璉真伽與元代飛來峰造像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186-187。

<sup>18</sup> 賴天兵，〈楊璉真伽與元代飛來峰造像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187 與 191 注 17。

蒙元考古與藝術》。該文基於 2008 年初親自尋訪杭州古跡的考察成果，計分四節，有一節題作「飛來峰楊璉真伽造像龕」，指出：「忽必烈還讓其子楊暗普接替脫脫，繼任江浙行宣政院使。至元三十年二月，又提升楊暗普為江浙行省左丞。」<sup>19</sup>「接替」、「繼任」云云，自然不盡正確。<sup>20</sup>所謂楊暗普自行宣政院使升為行省左丞，援據的《元史·世祖紀》文原作：「從阿老瓦丁、燕公楠之請，以楊璉真加子宣政院使暗普為江浙行省左丞」，<sup>21</sup>是否暗示史文「宣政院使」應為「行宣政院使」之誤？若然，這將是一個有意義的發現：不僅是對於《元史》記述的訂正，更且關涉楊暗普地位的評價。可惜的是，林氏似未注意到題記二的楊姓行宣政院使而有進一步的申說。

第二篇是朱晨所撰《杭州飛來峰元代造像研究》，係在 2012 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該文闢有一節清理飛來峰元代造像題記若干疑點，已據官職品秩高低立論，點出上引《元史》史文可能存在的問題：楊暗普自從一品的宣政院使，改任正二品的行省左丞，應是「降級」，何需他人建請？如若原是從二品的行宣政院使，經人薦舉升官，較為合情合理。<sup>22</sup>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創獲。不僅肯定飛來峰題記所見的楊姓行宣政院使即楊暗普，更且修正學界對楊暗普歷官及其定位的成說，亦即：暗普在至元三十年已任宣政院使，此後歷經數帝，「先後延續達二十年以上」，極為罕見，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地位相較其父更形重要。<sup>23</sup>以下對於朱氏的推論試作補充，並提出可能的疑問和個人淺見。

---

<sup>19</sup> 林梅村，〈故國不堪回首〉，頁 242。

<sup>20</sup> 脫脫於行宣政院開設之初即任頭院使，或在成宗大德四年去職。（見鄧銳齡，〈元代杭州行宣政院〉，頁 86）元代官署長官往往非只一人，行宣政院使亦然。楊暗普即便曾任院使，卻非接替脫脫，而是同時在任。

<sup>21</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7，〈世祖紀十四〉，頁 370。

<sup>22</sup> 朱晨，《中國龕窟造像史上最後的光亮——杭州飛來峰元代造像研究》，頁 42-44。

<sup>23</sup> 這個說法由陳高華提出後，幾為學界共識。（見陳高華，〈略論楊璉真加和楊暗普父子〉，頁 397）



一是關於楊暗普（An-p'u）曾任行宣政院使的補充。據陳高華所考，楊暗普於至元二十五年已任和林宣慰副使，最遲在至元三十年已是宣政院使。<sup>24</sup> 張云進一步認為暗普任宣政院使，應在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下臺與至元三十年之間，可能就是接替桑哥的院使遺闕。<sup>25</sup> 無論如何，楊暗普竟能在三至五年間，從正四品的地方軍政副使（和林宣慰副使），驟躍成為從一品的中央顯要大員，使人不能無疑。這段期間甚且包括其父身陷政治風波在內，更是難以置信。重新審視楊暗普歷官相關史料，不難發現所謂他在至元三十年二月以前已任宣政院使，唯一根據只有上引《元史》的記載。建請者之一的燕公楠（1241-1302），至元三十年由江浙行省參政復為大司農，可惜他的神道碑與《元史》本傳不載具體月次。<sup>26</sup> 他建請楊暗普任行省左丞之際，如在其行省參政任內，可謂薦舉個人上司；如在再任大司農後，應是推薦接替執政的人選。另外一位建請人阿老瓦丁（Al al-Din），回回人，至元三十至三十一年曾任江浙行省平章，元貞元年正月入朝為參政。<sup>27</sup> 他奏請楊暗普為左丞，可說是對於個人官銜下屬的引薦。無論如何，奏請將中央大員降調為地方官員，不免有疑，而當地宗教事務主管升任行省執政，確較合理。情理之外，有條材料可為旁證。《元典章》與《廟學典禮》二書均有至元三十年正月「脫脫、义木等行宣政院官人每」云云，<sup>28</sup> 不見楊姓院使之名，應已去職。這與前引《元史》記暗普於二月改任行省左丞契合。

<sup>24</sup> 陳高華，〈略論楊璉真加和楊暗普父子〉，頁 397。

<sup>25</sup> 張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頁 97。

<sup>26</sup> 〔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卷 8，〈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銘〉，頁 253；〔明〕宋濂等，《元史》卷 173，〈燕公楠傳〉，頁 4052。

<sup>27</sup> 楊志玖，《元代回族史稿》，頁 264。

<sup>28</sup> 今存《四庫》本《廟學典禮》將「义木」改譯為「察楚克」，陳高華等點校本《元典章》據以疑「义木」為「义朮」之誤。（見〔元〕不著撰人，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 53，〈刑部十五·訴訟·約會·儒道僧官約會〉，頁 1780-1781；〔元〕不著撰人，王頌點校，《廟學典禮》卷 4〈三教約會〉，頁 77 與卷 6〈提舉柯登仕申明約會〉，頁 122）

二是楊暗普曾任行宣政院使，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省思這個官署的定位。鄧銳齡較早撰文專門討論元代杭州的行宣政院，已清楚指出其設立的目的：「顯然與桑哥失敗後楊璉真伽在江浙的權力被遞奪有關，從另一角度看，即元室決定用一個新的俗人機構代替以往委任的僧人總統所。」<sup>29</sup> 賴天兵進而考定這個從僧人到俗人的江南宗教管理權力之移轉，直至大德三年（1299）五月後方告完成。<sup>30</sup> 現在看來，在所謂移轉過程的初期，楊璉真伽不僅一度復職，其子亦且成為這個「新的俗人機構」長官之一，與其說是從僧人到俗人，更可看成楊氏父子權力的世代傳承。

三是朱氏懷疑楊璉真伽已無官復原職的可能，進而指出飛來峰至元二十九年的兩條題記都出自楊暗普之手。這個說法的論據恐怕難以經得起推敲。他根據楊暗普於至元三十年五月因江南民怨其父而被罷官，<sup>31</sup> 就斷言楊璉真伽不可能在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再次任職，顯有以後事論前事之嫌。此其一。其二，他認為兩龕的位置與題記文字、內容及時間幾乎完全一致，應是出於一人亦即楊暗普之手。在暗普的授意之下，「留下了此時本不可能有的楊璉真伽原有職位及名號的題記」，卻為掩人耳目，刻意只用「楊」姓落款，「這也是元代造像題記中僅有的只有姓氏的題記」。<sup>32</sup> 事實上，父子同時開造龕像，形制如出一轍，不難想見，即便是一人所為，亦不足怪。然而冒用乃父已遭朝廷罷撤的官銜，公然造像刻記，楊暗普即便神通廣大，大概不至於如此招搖。何況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的「楊」姓永福大師，除了楊璉真伽，當世恐難再作第二人想，豈不欲蓋彌彰？而所謂元代造像題記中僅見「只有姓氏的題記」，更是不盡正確。在飛來峰其他元代造像題記中，屢見「徐僧錄」、「經歷郭」、「楊總統」

---

<sup>29</sup> 鄧銳齡，〈元代杭州行宣政院〉，頁 86。

<sup>30</sup> 賴天兵，〈關於元代設於江淮／江浙的釋教都總統所〉，頁 68。

<sup>31</sup> 楊暗普之父楊璉真伽雖是河西僧人，但有妻、有子是當時的普遍現象。此外，楊暗普生卒年不詳，可能卒於延祐元年至四年之間（1314-1317）。（考見馬曉林，〈元代八思巴帝師祭祀研究〉，頁 86-87）

<sup>32</sup> 朱晨，〈中國龕窟造像史上最後的光亮——杭州飛來峰元代造像研究〉，頁 44。

（楊璉真伽）等「只有姓氏」的造像主，楊璉真伽可能更有直接使用「永福大師」而連姓氏都未留下的題記。<sup>33</sup>

四是朱氏認為楊暗普自行宣政院成立即已就任院使，而於至元三十年被罷行省左丞，「也有可能行宣政院使一職也同時被罷」，<sup>34</sup> 係指暗普以左丞兼任院使。事實上，楊暗普始任行宣政院使的時間，以及改任行省左丞仍否兼任院使，史無明文，不便臆測。可以確定的是，據上引《元典章》與《廟學典禮》二書所載，楊暗普可能於至元三十年正月已經不再是行宣政院使。

### 三、功德回向對象及其寓意

如上所述，兩條題記的功德主應即楊璉真伽父子，而他們所具的特殊身份與身處的政治風波，使其造像無法被視為單純的祈福活動。至元二十八年正月，桑哥論罪罷廢，半年之後就遭處決。這位權臣及其黨與，包括楊璉真伽在內，前後歷經一系列的論罪與清算。就在楊氏父子龕像完工的四個月前（至元二十九年三月），省臺諸臣甚至奏請將楊璉真伽「乞正典刑以示天下」，情勢險峻之至。不過，由於世祖的特別庇護，楊璉真伽既可免除死刑，又得發還已經沒官的人口與土田，<sup>35</sup> 不久後更是官復原職。楊氏復職之後，行事趨於低調，幾乎消失於史冊。然而，他對於江南宗教事務的權力，已逐漸移交到其子之手。楊氏父子造像的動機，無論是感謝世祖不殺之恩，或是希圖獻媚以求再起，恐怕都不免帶有強烈的政治考量。他們不僅遠離舊有的造像區域而於呼猿洞另闢新區，更且採用藏式和漢式風格對應開造兩處一佛二菩薩的三聖龕像。<sup>36</sup> 如此慎擇造像的地點與題材，顯然用心良苦。

細繹兩條題記所見造像功德回向對象序列，看似習見的造像祈願套語，卻有助於進一步解讀楊氏父子造像的精心安排。回向的對象，除百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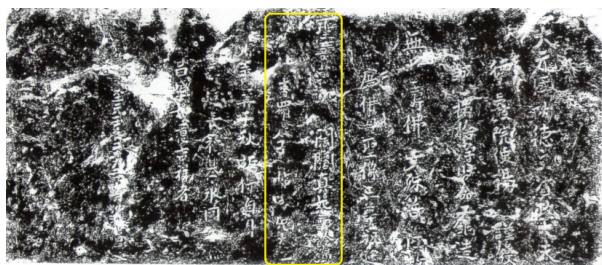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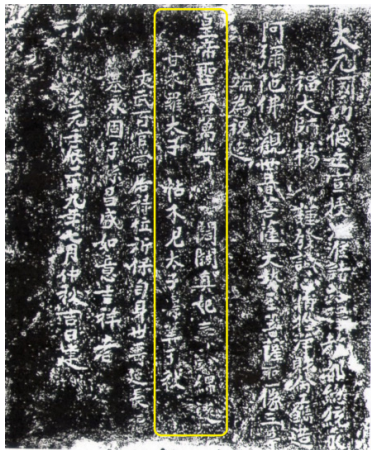
<sup>33</sup> 有關記文詳見楊曉春，〈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頁 430-431。

<sup>34</sup> 朱晨，《中國龕窟造像史上最後的光亮——杭州飛來峰元代造像研究》，頁 44。

<sup>35</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7，〈世祖紀十四〉，頁 362。

<sup>36</sup> 楊曉春，〈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頁 438、443。

（僅見於題記一）、自身及其子孫外，更為重要的是帝室成員——皇帝、妃子與兩位太子。皇帝指的是元世祖（1260-1294 在位），明確無疑，而其後的闊闊真妃和甘木羅、帖木兒兩位太子，容易不疑有他，就認定是世祖的妃子和兒子。事實不然。只要有心查檢元代文獻，不難發現他們應即已故皇太子真金遺孀闊闊真（Kökejin, ?-1300），以及真金的兩個兒子——甘麻剌（Kammala, 1263-1302）與鐵穆耳（Temür, 1265-1307）。<sup>37</sup> 楊氏父子深知當時元廷政治態勢，顯然有所措意，決非偶然為之。兩條題記的行款（請見以下圖一與圖二）可為明證。第 98 龕題記將國家（大元國）、佛名（阿彌陀）與皇帝採用雙抬形式，亦即較尋常各行高上二格，兩位太子則用單抬，地位高下明顯有別；第 99 龕題記抬頭格式較不明確，但國家、佛名與皇帝都較高一至二格。值得注意的是，兩龕題記提到皇帝與闊闊真妃，兩者同列，其間只有一字空白的挪抬。闊闊真當時政治地位之尊崇，不免引人懸揣。



圖一（左圖）：第 98 龕造像題記拓影<sup>38</sup>

圖二（上圖）：第 99 龕造像題記拓影<sup>39</sup>

<sup>37</sup> 題記俱稱甘木羅與帖木兒為「太子」，實則二人應是皇孫。自漢朝以來，皇帝立為嗣君的嫡子始稱太子或皇太子，但元代成吉思汗黃金氏族的男性子嗣大都得以自稱或他稱太子，詞義有所變化。（見〔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 29，〈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頁 674-675；另參洪金富，〈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頁 753）

<sup>38</sup> 高念華主編，《飛來峰造像》，頁 140。圖框為筆者所加以提請注意者。

<sup>39</sup> 高念華主編，《飛來峰造像》，頁 124。圖框為筆者所加以提請注意者。

闊闊真，一名伯藍也怯赤（Baïram-ckeči），弘吉剌氏，世祖皇太子真金（Jingim, 1243-1286）元妃。她在丈夫死後（1286），守寡育子，維持諸子競逐皇座的政治資本，終於至元三十一年扶持少子鐵穆耳繼位。此後元朝皇帝無不出自真金胄裔，對於元代中後期的政治影響深遠。元代皇室自世祖以降奉佛，特別尊崇藏傳佛教。闊闊真受到夫家家風濡染所及，同樣對於藏傳佛教，特別是與薩迦派的八思巴（'Phags-pa, 1235-1280）帝師關係較為密切而曾受戒法。<sup>40</sup> 以她的地位及其與佛教的關係，地方官員造像祈福，羅列皇室成員以為功德回向對象，得見其名，原本不足為奇。只是祝願皇帝聖壽萬歲之後，為何僅列太子妃和兩位皇孫？為何沒有提及當朝正宮南必（Nambui）皇后？

遺憾的是，我們目前無法找到其他闊闊真和楊璉真伽父子相關的史料。不過，這種世祖與太子妃及兩位皇孫的特殊記述形式，元代文獻似乎僅此二見，值得深究。下文將據以作為闊闊真生子問題的佐證，並研析世祖南必皇后闕載的原因及其可能意義。

### （一）真金元妃闊闊真生子問題的佐證

《元史》所記闊闊真生子相互矛盾，引致後世學者聚訟，莫衷一是。該書〈顯宗傳〉明載顯宗甘麻剌乃闊闊真所生，但闊闊真本傳卻僅記生有二子——順宗答剌麻八剌（Darmabala, 1264-1292）與成宗鐵穆耳，<sup>41</sup> 顯見齟齬，令人對於甘麻剌生母產生質疑，甚而形成闊闊真偏向親生子鐵穆耳繼立的推論。其中，周良霄曾經數度開展論述，值得提請討論如下。

1986 年，周良霄撰文考察世祖以後諸家勢力對於皇位的爭奪，析論蒙古選汗舊制遺留是造成紛爭不止的重要因素。該文參引俄譯本《史集》，指出「甘麻剌既系真金長子，而長於行三的鐵穆耳才一歲。則他比行二的答剌麻八剌所生只可能以月日計，其不可能為闊闊真所生甚明」，質疑《元史·顯宗傳》所記生母是泰定帝偽造以自擡身價，進而根據子從

<sup>40</sup> 拙著，〈論元朝闊闊真太后的崇佛〉，頁 76-80。

<sup>41</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15，〈顯宗傳〉，頁 2893；卷 116，〈后妃傳二〉，頁 2898。

母貴的蒙古舊俗，認為甘麻刺自然無法獲得支持。<sup>42</sup> 究其立論根基，在於俄譯本《史集》記甘麻刺與鐵穆耳爭位時，特別指明前者年長後者一歲。所引《史集》（*Jami'al-tawarikh*, 1311 年成書）應是俄譯原本（1946-1960 年出版），未及參考目前通行俄譯本的漢文重譯本（1985 年 7 月初版）。今檢諸漢文重譯本，相應處作：「在鐵穆耳合罕與長他幾歲的〔兄長〕甘麻刺之間在帝位繼承上發生了爭執。」<sup>43</sup> 可知甘麻刺與鐵穆耳僅差一歲之說恐有問題。1992 年，周良霄又在譯注《史集》英譯本中出有按語，雖仍未能參用現行俄譯本的漢文重譯本，但已經修正甘麻刺為「長彼幾歲之兄」。<sup>44</sup> 即便如此，他並未釋疑，仍然堅持甘麻刺應非闊闊真親生，《元史·顯宗傳》記述乃經泰定帝附會而成。<sup>45</sup> 綜言之，甘麻刺生母問題似小實大，關係至重。不僅牽涉到《元史·顯宗傳》史源可能出於附會或偽造，更重要的是影響世祖死後的選汗大會，以至於左右元朝帝系的傳承。筆者認為甘麻刺非闊闊真所生之說，恐難成立，略抒蠡見如下。

首先就真金三子生年而言。真金三子生卒年壽，史籍不難索考：長子甘麻刺，據《元史》本傳載，卒於大德六年正月十日，享年四十，可知生

---

<sup>42</sup> 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頁 43。《元史·顯宗傳》係出泰定帝偽造云云，顯然不盡正確。泰定帝當然無法偽造明初纂修的《元史》，周氏應是意指泰定帝在《顯宗實錄》動了手腳，而為《元史》所沿襲。

<sup>43</sup>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 376。

<sup>44</sup> 〔波斯〕刺失德丁原著，〔英〕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又記》，頁 6。

<sup>45</sup> 〔波斯〕刺失德丁原著，〔英〕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 398。值得注意的是，今存邵循正據波斯文《史集》譯釋的殘稿之中，相關記述譯作「甘麻刺長鐵木耳合罕一歲，二人爭大位辨論不決」，但未出注推衍疑義。（見邵循正，〈刺失德丁《集史·鐵木耳合罕本紀》譯釋殘稿〉，頁 78）

於中統四年。<sup>46</sup> 如再結合《高麗史》記載，可以確定生日為三月十一日。<sup>47</sup> 據生卒年月推算，年歲未滿四十，應是概略言之。次子答剌麻八剌，據《元史》本傳載，卒於至元二十九年，得年二十九，可知生於至元元年。<sup>48</sup> 如再結合《析津志·原廟·行香》篇記載，可以進一步考知答剌麻八剌生於六月四日，死於五月八日。<sup>49</sup> 三子鐵穆耳，據《元史·成宗紀》載，生於至元二年九月五日，<sup>50</sup> 崩於大德十一年正月八日，<sup>51</sup> 壽四十有二。總之，三子各自生於中統四年三月、至元元年（中統五年）六月與二年九月，看似連年而生，但年齡差距均在一歲以上，毫無可疑。甘麻刺實長鐵穆耳二歲有餘，前引俄譯本《史集》稍長幾歲云云，用語不夠精確，卻無大謬。

其次討論《元史·后妃傳》記載所生子嗣形式。按〈后妃傳〉史料來源大抵有四：一是歷朝修纂的后妃列傳，二是《累朝實錄》、《經世大典》的〈宗親歲賜〉篇與順帝朝時政記，三是元人所撰冊文，四是《元史》各傳可資參照者。<sup>52</sup> 來源紛雜不一，記述詳略與形式無定，自然無法盡據，難以求備。茲舉蒙元帝國最為重要的兩位后妃——太祖皇后孛兒帖夫人（Börte Qadun, 1161-?）與拖雷元妃唆魯禾帖尼（Sorqaytani, 1199-

---

<sup>46</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15，〈顯宗傳〉，頁 2895。甘麻刺卒於大德六年正月十日，《元史》本傳與〈成宗紀〉文俱載，明確無疑。《高麗史》於該年正月九日條下記「金延壽還自元，報晉王甘麻刺之薨」云云，或有訛誤。（見〔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 32，〈忠烈王世家五〉，頁 9 下）

<sup>47</sup>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 33，〈忠宣王世家一〉，頁 8 下。

<sup>48</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15，〈順宗傳〉，頁 2895。

<sup>49</sup>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頁 14-15。

<sup>50</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81。

<sup>51</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21，〈成宗紀四〉，頁 472。

<sup>52</sup> 王慎榮主編，《元史探源》，頁 152-154。

1252) 為例。<sup>53</sup> 孛兒帖在《元史》的本傳見於卷 114〈后妃傳一〉，位列蒙元諸帝后妃之首，然篇幅有限而多奪誤，不僅未書名諱，更無隻字提及所生習稱帝國四柱的四子。唆魯禾帖尼本傳見於卷 116〈后妃傳二〉，居於追尊四帝元妃之先，僅二百六十三字，多載追尊謚號與謚冊文字，不記身世、事跡與年壽等生平基本資料，內容貧乏。世所習知的四子僅存記憲宗與世祖二人。我們無法據以推論孛兒帖不曾生育，或是唆魯禾帖尼只有二子，毋庸置疑。闊闊真《元史》本傳的情形亦可作如是觀。必欲追究闕漏顯宗的緣由，出自常執政權的順宗後人手筆，應更合理。泰定帝在泰定元年（1324）十二月始修的《顯宗實錄》，修纂、成書和流傳情形不詳，<sup>54</sup> 即便泰定帝可以「偽造」或「附會」，可否存留而為《元史》纂修者採錄，都是難以求解之謎。

以上二點分析只能排除甘麻刺與鐵穆耳絕非同胞說法的論據，以下引列中外文獻或可作為兩人應是一母所生的根據。至元十三年正月，八思巴於所撰《為造佛經所題之贊語》題記，有云：「因寫造佛經之善德及其他根本善業匯聚之故，皇子真金、其妃闊闊真、其長子甘麻刺、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鐵穆耳、女兒古洛格迪及彼等之後代子孫，世間陽壽長如江河，榮華富貴滿如大海，權勢煊赫猶如天界之王。」<sup>55</sup> 將甘麻刺三兄弟與其父母並列，更添入一位鮮為人知的胞妹，同受寫造佛經的祝禱與功德。此其一。第二是 1311 年成書的《史集》。其中敘述忽必烈汗后妃及其諸子，提到第二個兒子真金「遺留下三個榮耀的兒子」，生母名諱雖然漏奪，甘麻刺三兄弟卻俱見載。三兄弟如非同胞，理應有所表述。<sup>56</sup> 第

---

<sup>53</sup> 孛兒帖生年，考見 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vol. I, p. 334。唆魯禾帖尼生卒年，請詳拙著，〈唆魯禾帖尼生卒年壽及其相涉史事〉，頁 43-82。

<sup>54</sup> 王慎榮主編，《元史探源》，頁 155。

<sup>55</sup> 轉引自陳慶英，《雪域聖僧——帝師八思巴傳》，頁 199。引文省略諸名後括注的對音。

<sup>56</sup>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 283。此處不記真金妻子與諸子之母名諱，令人不解。這在《史集》重視世系與詳記長妻、生母的慣例之中殊為罕見，何況是遺漏了闊闊真這樣一位重要的后妃。



三是姚燧於仁宗朝奉敕撰寫〈普慶寺碑〉。碑記闊闊真在真金死後，「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蠹傷乃心」。<sup>57</sup> 告誡撫慰真金都已長立之諸子，應是出於母子親情的天性。第四是 1363 年成書的元代藏文文獻《紅史》（*Deb-tber dman-po*）。該書記述蒙古元朝世系承傳，明載甘麻刺三兄弟為真金與闊闊真所生。<sup>58</sup> 第五是修纂於明初的《元史》。甘麻刺本傳文中稱鐵穆耳為「母弟」，泰定帝即位詔也一再自稱世祖「嫡孫」與「嫡派」，<sup>59</sup> 並在追上其父諡議有「裕皇之長嫡」云云。<sup>60</sup> 蒙古社會原行一夫多妻制，諸妻之中又以首次正娶的「元配」（*abali gergen*）地位最高，元配之子方具繼承職守與爵位的權力。<sup>61</sup> 甘麻刺及其子如非嫡出，恐難杜悠悠眾口，遑論獲得爭位機會。最後是本文討論的兩條題記。題記只見闊闊真及其長、少二子，不記次子答刺麻八剌之名，原因是他已於造像告竣的兩個月前（五月八日）逝去。回向對象限於在世者，列名決非偶然，不可等閒視之，甘麻刺如非嫡長，恐怕難以名列鐵穆耳之前。

---

繹味前後記述，頗有可疑。釋疑需要一點篇幅，且與本文關係不大，請容另文為之，茲不具述。

<sup>57</sup>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 11，頁 159。碑無明確寫作年月，但據文中稱仁宗為「今皇上」，應是在仁宗朝所撰。

<sup>58</sup> 〔元〕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頁 27。

<sup>59</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15，〈顯宗傳〉，頁 2894；卷 29，〈泰定帝紀一〉，頁 638-639。

<sup>60</sup> 題作〈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諡議〉，原見於元代第一部官修綜合性禮書《太常集禮》。《太常集禮》今已無存，茲據馬曉林輯佚。（見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頁 766）

<sup>61</sup> 札奇斯欽，《蒙古文化與社會》，頁 93。

## （二）世祖南必皇后闕載原因及其意義

題記不見當朝正宮南必皇后之名，殊是可疑。至元十八年二月，真金母后察必（Čabi, ?-1281）卒逝。<sup>62</sup> 兩年後的正月，忽必烈納娶察必侄女南必（Nambui）為后，繼守正宮。南必頗預朝政，相臣時常無法覲見年近七旬的忽必烈，必須「因后奏事」。<sup>63</sup> 至元二十二年年年初，權臣阿合馬（Ahmad, ?-1282）餘黨揭露南臺御史奏請忽必烈禪位真金的封章，引起政治風波，竟使真金在年底驚懼致死。這份封章除請求禪位外，更是特別提到「皇后不宜預外事」，<sup>64</sup> 足見南必的政治影響力已構成真金掌政的威脅。真金死後，南必應該更有擴權的餘地，何況她與忽必烈生有一子鐵蔑赤（Temeči），既是正宮所出而為廣義的嫡子，同樣具備角逐皇位繼承者資格。

今存鐵蔑赤有關記載極少，似僅有《元史》一見其名，附其母本傳之後，但記「有子一人，名鐵蔑赤」，不過八字而已。<sup>65</sup> 《元史·宗室世系表》列記世祖十子，甚至沒有提及其人。<sup>66</sup> 《史集》所見世祖諸子名單，共有十二人，對照《元史·宗室世系表》，不僅次序稍異，更且多出二人：一為蔑兒乞惕（Merkit）氏忽魯黑臣（Qorugchin）哈敦所生的第五子忽里帶（Qoridai），一為南必所生「名字不知」的第十二子。<sup>67</sup> 《史

---

<sup>62</sup> 察必卒年，《元史》的〈世祖紀〉與〈后妃表〉都記為至元十八年，但其本傳誤為至元十四年，有關辨析與南必出身及繼守正宮時間的討論，見邵循正，〈《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頁 6-7；邵循正，〈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頁 21；F. W. Cleaves, "The 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Čabi in the *Yüan shih*," p. 145, n. 45.

<sup>63</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2，〈世祖紀九〉，頁 249；卷 106，〈后妃表〉，頁 2697；卷 114，〈后妃傳·世祖南必皇后〉，頁 2873。

<sup>64</sup> 〔元〕孛朮魯朮，《菊潭集》卷 2，〈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頁 12 上。

<sup>65</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14，〈后妃傳·世祖南必皇后〉，頁 2873。

<sup>66</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 107，頁 2724。

<sup>67</sup>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 282-287。

集》另在敘述弘吉剌惕部落篇章之中，提到南必兒子名為奧魯赤（Auruqči）。<sup>68</sup> 這是明顯誤記。奧魯赤不是南必所生，而是世祖另后朵兒別真（Dörbejin）所出，與忽哥赤（Hügeči）為同胞兄弟。<sup>69</sup>《馬可波羅行紀》雖未詳列世祖諸子之名，但卻提到大汗「生男二十二人」。所謂「二十二人」，已有學人疑是「十二人」之訛，出於傳鈔致誤，並有不同鈔本為據。<sup>70</sup> 忽必烈生有十二子之說，應當可信。<sup>71</sup>

元朝宗系本是內廷秘密，外人「莫能知也」，《元史·宗室世系表》自然無法「盡得其詳」。<sup>72</sup> 忽里帶與鐵蔑赤二人的失載，姑且毋論政治操作的刻意遺漏，二人夭亡以致生平難詳，應是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忽里帶生母忽魯黑臣哈敦，原是忽必烈長妻，《史集》兩度記述其人，一說無子而位不尊，一說生有忽里帶，似見扞格。邵循正已經指出《史集》的矛盾，並試圖予以疏通：忽里帶早殤無後，其母忽魯黑臣也未再生育而地

<sup>68</sup>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267。

<sup>69</sup> 邵循正，〈《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頁4-5。該文另亦論及《史集》所記南必皇后所生子名為 jarqujī，jarquī- 應是 tama- 之誤。（頁7）

<sup>70</sup> 〔意〕馬可波羅著，〔法〕A.J.H. Charignon 注，馮承鈞譯，党寶海新注，《馬可波羅行紀》第83章，〈大汗之諸子〉，頁306-308。另參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 569.

<sup>71</sup> 《漢藏史集——賢者喜樂瞻部洲明鑒》，著於1434年，體裁略同《紅史》，記事更為詳細。該書同記忽必烈汗共有十二子，並詳列其名。所記諸子次序異於《元史·宗室世系表》與《史集》，而不見於《元史》的也先不哥與朵羅二子，或謂鐵蔑赤和忽里帶的異譯或異稱，仍待論證。（見〔西藏〕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賢者喜樂瞻部洲明鑒》，頁154；陳慶英、史衛民，〈大蒙古王統綜述——《漢藏史集》節譯并注釋〉，頁8與12注31）

<sup>72</sup> 〔明〕宋濂等，《元史》卷107，頁2705。大德三年，忠宣王受責退位，其罪名之一就是「擅寫皇朝帝系」。（見〔明〕宋濂等，《元史》卷208，〈外夷傳一·高麗〉，頁4622）

位不顯，以致母子之名不見於《元史》。<sup>73</sup> 至於鐵蔑赤，屠寄曾以其名不見《元史·宗室世系表》，推測應是「早殞」。<sup>74</sup> 屠氏的推測不僅合理，更可得到藏文史籍《紅史》的佐證。《紅史》先記世祖與察必所生四位嫡子之名，後云：「他與偏妃涉恭瑪所生的兒子六人，共計薛禪汗有十個兒子。」《紅史》未能詳列偏妃六子之名，但十子之說可與《元史》相為呼應，而其後補充更為重要：「此外，他與南必皇后生有一子，早夭。」<sup>75</sup> 鐵蔑赤逝世時間難以索考，如以本文討論的兩條題記不見他及其母的名字，可能是已經亡故的關係。在《史集》列舉推選成宗的忽里勒台出席名單之中，南必只有攜女別克臣（Bekchin）與會而無其名，也就不足為奇。<sup>76</sup> 假使這個推論可以成立，這兩條題記可謂提供了「獨家」的間接記載。南必於至元二十年繼守正宮，隔年如若順利生下鐵蔑赤，至元二十九年楊氏造像落成之時，其子至多九歲，謂之早夭，似無不可。南必處境——生有一子早亡而未再得男，令人聯想到前述忽必烈長妻忽魯黑臣，「因為她沒有孩子，所以她的地位低於其他諸妻」。<sup>77</sup> 南必《元

<sup>73</sup> 邵循正，〈《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頁 3。

<sup>74</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19，〈后妃傳〉，頁 9 上。

<sup>75</sup> 〔元〕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頁 27。《紅史》所記蒙古世系是從「小冊子」《脫卜赤顏》節文抄錄，與拉施特《史集》取資的伊利汗宮廷秘籍《金冊》係屬同源史料。（見陳得芝，〈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札記〉，頁 30-35）此外，《雅隆尊者教法史》與《紅史》同為十四世紀藏族傳統史學代表著作，對於忽必烈子嗣亦有記錄，云：「忽必烈之皇后有朵兒只、真金、忙哥刺、那木罕四子。小妃之子為忽哥赤、奧魯赤、愛牙赤、忽都魯帖木兒、耳色波喀、脫歡、闊闊出。」（見〔西藏〕釋迦仁欽德著，湯池安譯，《雅隆尊者教法史》，頁 52）不僅再次提到四位嫡子名字，更且詳記「小妃」（《紅史》所謂「偏妃涉恭瑪」）所生六子之名，其中的「耳色波喀」尤為諸書未見而難以勘同。

<sup>76</sup>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 376。

<sup>77</sup>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 187。

史》本傳記載甚為疏略，語涉朦朧，只說對於朝政頗見干預，相臣且要因之奏事，卻未曾見參與任何重大決策。<sup>78</sup> 細繹南必繼守正宮後的《元史·世祖紀》文與有關史事，可知當時軍國大事仍由重臣親自進奏，而由世祖獨斷，包括啟用與廢誅桑哥，以及漠北軍務佈署等等，並無絲毫南必干政的蛛跡可尋。鐵蔑赤的早死，可能已使南必失去可以操作的政治空間，而本文討論的兩條題記闕載其母子之名，可以說是一種獨家的間接「見證」。至於題記所見闊闊真的兩位太子——甘麻剌和鐵穆耳，就是當時角逐下任皇帝的候選人，顯見楊璉真伽父子政治眼光之精準。楊暗普雖因江南民怨其父而一度罷官，卻無妨於之後的再受重任，其來有自也。

## 四、結論

元代飛來峰的造像活動，以至元二十九年為最盛，本文取擇該年的兩條題記，無論是所造龕像的隆重與正式，抑或回向對象透露的訊息，都饒具意義。本文聚焦於題記功德主與回向對象兩個方面，不僅補充和檢討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更希望據以追尋「文字背後的歷史真相」。<sup>79</sup>

對於兩條題記提到的兩位楊姓功德主，已有三數學者加以考訂。第一條題記功德主為楊璉真伽，應無疑義。楊璉真伽長年主管江南佛教事務，

<sup>78</sup>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p. 225. 今存關於南必史料極為有限，仍待鉤考。元人許有王所撰〈大興國寺碑〉相關文字無多，卻已是難得的記載。碑文提到該寺創寺比丘尼監藏巴，原是察必「俾掌鑰，司出納」的常姓宮女，察必死後，她時年十九，「移事嗣后，寵信尤篤」。五年之後奉旨適近臣瓮吉剌歹，「奩具之費，悉資內帑」。「嗣后」無疑就是南必皇后。（見〔元〕許有王，《至正集》卷 60，頁 29 上）

<sup>79</sup> 語出陸揚為《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所撰書評論文，文題〈從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為中心〉。（頁 104）他在這篇富有啟發性的論文裡，指出：考釋墓志史料價值固然重要，但追索墓志「沒有直接告訴我們」而已於歷史紀錄中消失的片斷，往往需要發揮史學想象力，更加賦有挑戰性。這無疑是不刊之論，也是本文希望可以企及的境界。

聲勢煊赫一時，是元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這條題記是目前可見楊氏最後活動的紀錄與一度官復原職的證明，史料價值不言可喻。第二條題記的功德主，已有學者論定是楊璉真伽之子楊暗普，其說關涉《元史》史文脫漏的問題，雖可成立，但仍有補充與檢討的餘地。本文重新疏理問題，補充旁證材料，並訂正過度推論的謬誤。這條題記作為楊暗普曾任行宣政院使的證據，有助於重新省思前人成說：一是有關楊暗普歷官及其定位。楊暗普雖由行宣政院使陞遷行省左丞，不到三個月就因江南民怨罷官，此後直至至大四年（1311），史籍再見其人，已是宣政院官。從至元三十年罷左丞之職到至大四年為宣政院官的十餘年間，暗普歷官闕載不詳，廿餘載長居宣政院使之說，恐待更多材料的佐證。二是有關行宣政院的定位。元廷設立行宣政院的目的，應是希望用俗人機構取代僧人總統所。不過，在移轉過程的初期，楊璉真伽不僅一度復職，其子更是成為這個「新的俗人機構」長官之一，似可看成楊氏父子權力的世代交替。簡而言之，這兩條題記，很有可能是楊璉真伽父子歷官的「獨家」記載，有助於重新思考楊氏父子的政治地位，以及行宣政院設立初期的意義。

關於回向對象代表的意義，前人較少措意，而為本文所欲追索的「文字背後的歷史真相」。楊璉真伽父子的造像活動，由於所處的特殊時空背景，恐怕不免帶有強烈的政治考量。他們深知當時元廷政治態勢，精心安排了功德回向對象的行款和序列。他們在當朝皇帝之後，選列的是已故皇太子真金遺孀闊闊真及其二子，而無當時正宮南必皇后之名。經過疏證，不僅可以作為甘麻刺與鐵穆耳都是闊闊真所生的佐證，從而解決成宗係以親生子繼位的疑問；更可能是南必皇后幼子早夭的間接證據，有助於說明南必至此已喪失競爭皇位的政治資本。由於史闕有間，推論可能無法完全落實，是非對錯，尚待更多新舊材料來驗證。

## 【參考書目】

### 一、佛教藏經與古籍

- 《元史》，〔明〕宋濂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元典章》，〔元〕不著撰人，陳高華等點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廿二史劄記校證》，〔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 《史集》第二卷，〔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波斯〕刺失德丁原著，〔英〕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至正集》，〔元〕許有壬，《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據清宣統3年（1911）聊城鄒氏石印藏鈔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姚燧集》，〔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紅史》，〔元〕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 《馬可波羅行紀》，〔意〕馬可波羅著，〔法〕A.J.H. Charignon 注，馮承鈞譯，党寶海新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 《高麗史》，〔朝鮮〕鄭麟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據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1451）朝鮮活字本影印，濟南：齊魯書社，1996。
- 《程鉅夫集》，〔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菊潭集》，〔元〕李昉魯翀，《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據《藕香零拾》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鄂多立克東游錄》，〔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81。
- 《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釋迦仁欽德著，湯池安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 《漢藏史集——賢者喜樂瞻部洲明鑒》，〔西藏〕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

英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蒙兀兒史記》，屠寄，臺北：鼎文書局，1994 六版。

《廟學典禮》，〔元〕不著撰人，王頌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 二、專書與論文

王慎榮主編 1991 《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札奇斯欽 1987 《蒙古文化與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朱晨 2012 《中國龕窟造像史上最後的光亮——杭州飛來峰元代造像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文。

周良霄 1986 〈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元史論叢》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

林梅村 2013 〈故國不堪回首〉，收入氏著，《大朝春秋——蒙元考古與藝術》，北京：故宮出版社。

邵循正 1985a 〈《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收入氏著，《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邵循正 1985b 〈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收入氏著，《邵循正歷史論文集》。

邵循正 1985c 〈刺失德丁《集史·鐵木耳合罕本紀》譯釋殘稿〉，收入氏著，《邵循正歷史論文集》。

洪金富 2008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頁 1-40。

洪金富 2010 〈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頁 737-767。

馬曉林 2012 《元代國家祭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馬曉林 2013 〈元代八思巴帝師祭祀研究〉，《北大史學》18，頁 81-103。

高念華主編 2002 《飛來峰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

高致宇、蘇金成 2014 〈杭州飛來峰佛教造像的研究現狀分析〉，《新視覺藝術》2014.2，頁 50-52。

張云 1998 《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許正弘 2015a 〈唆魯禾帖尼生卒年壽及其相涉史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3，頁 43-82。

許正弘 2015b 〈論元朝闊闊真太后的崇佛〉，《中華佛學研究》16，頁 73-103。



- 野上俊靜 1978 〈桑哥と楊璉真伽——元代宗教史の一面——〉，收入氏著，《元史釋老傳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頁 240-266。
- 陳高華 1991 〈略論楊璉真伽和楊暗普父子〉，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
- 陳高華 2010 〈再論元代河西僧人楊璉真伽〉，收入氏著，《元朝史事新證》，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 陳得芝 2012 〈從「銷金鍋兒」到民族熔爐——元代杭州與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變〉，收入李治安、宋濤主編，《馬可波羅游歷過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
- 陳得芝 2014 〈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札記〉，《中國藏學》2014.4，頁 30-35。
- 陳慶英 2002 《雪域聖僧——帝師八思巴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陳慶英、史衛民 1987 〈大蒙古王統綜述——《漢藏史集》節譯并注釋〉，《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7.1，頁 7-15。
- 陸揚 2006 〈從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84，頁 95-127。
- 湯開建 2005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收入氏著，《党項西夏史探微》，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
- 楊志玖 2003 《元代回族史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楊曉春 2012 〈杭州飛來峰元代佛教造像的開鑿過程、開鑿者與造像風格問題——造像題記的綜合研究〉，收入李治安、宋濤主編，《馬可波羅游歷過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
- 鄧銳齡 1995 〈元代杭州行宣政院〉，《中國史研究》1995.2，頁 85-94。
- 賴天兵 1998 〈杭州飛來峰元代石刻造像藝術〉，《中國藏學》1998.4，頁 96-107。
- 賴天兵 2004 〈楊璉真伽與元代飛來峰造像相關問題的探討〉，收入霍巍、李永憲主編，《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賴天兵 2010 〈關於元代設於江淮／江浙的釋教都總統所〉，《世界宗教研究》2010.1，頁 55-68。
- 賴天兵 2012 〈元代的釋教都總統所與楊總統〉，收入李治安、宋濤主編，《馬可波羅游歷過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
- 賴天兵 2015 《漢藏瑰寶——杭州飛來峰造像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 謝繼勝等 2014 《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研究》，北京：中

國藏學出版社。

Cleaves, F. W. 1979-80 “The 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Čabi in the *Yüan shih*.”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3/4, pp. 138-150.

Pelliot, Paul. 1959-73 *Notes on Marco Polo*.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Rachewiltz, Igor de. 2006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Rossabi, Morris. 1988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with Date of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Zhiyuan of the Feilai Peak in Hangzhou at Yuan Dynasty**

Hsu, Cheng-Hung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valuable inscriptions engraved on the Feilai Peak in Hangzhou with date of the twenty-ninth year of Zhiyuan at Yuan dynasty.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personages mentioned as sponsors in the inscriptions, point out the value of the royals' titles not found elsewhere, and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are materials in the context of Mongol-Yuan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two sponsors were Yang Rin-chen rgya and his son Yang An-p'u. These two inscriptions could be regarded as exclusive records about their offices, and help to rethink abou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Xing Xuanzheng Yuan establishment. They were also presented as indirect evidences about Kökejin who had three natural sons and Nambui's son who died young.

### **Keywords:**

Yang Rin-chen rgya, Yang An-p'u, Kökejin, Nambui, Xing Xuanzheng Yuan